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双向维度

郑元景¹, 余章宝²

(1.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马克思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践特质内在含有对现代性的批判向度和建设向度。马克思对支撑着现代性的理性、主体和历史终结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判, 并在共产主义这一制度安排下得到扬弃和重建。

关键词: 理性; 主体性; 历史终结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05)03-0001-05

作者简介: 郑元景(1973-), 男,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福建农林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余章宝(1967-), 男,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 经济学博士后。

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性何以可能? 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性问题已被提出多年, 但是, 由于没有很好地弄清马克思理论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并没有自觉提供一种较合理的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相反, 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讨论却不自觉地为这种分析框架提供了一种可能。面对现代性的历史境遇, 一方面, 马克思理论的当代意义只有放到对现代性的回应框架中才能够得到很好的阐释和彰显, 这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 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对现代性所作的深刻批判,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性。同时, 这一分析框架也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对话的思想平台。

一、理性的解构和重建

现代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而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现代性肇始于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宣告、表达出了以“理性”、“自由”为标志的时代精神, 它标志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个时代被黑格尔称之为“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1](P719)}。理性在启蒙运动中是人们用以替代上帝、判定一切存在是否合理的法庭。恩格斯对现代性的特征有过一段经典的描述:“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

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2](P15)} 启蒙时代总是被冠以“理性时代”的标志, 现代性就是理性的另一种说法。从笛卡尔起, 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 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 树立理性的权威, 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从此, 这股理性主义观念弥漫到整个欧洲社会思想中。理性、主体性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本质, 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传统理性的无限权威, 是建立在贬低、压制和扭曲非理性的基础上的, 然而物极必反, 在对西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着力揭露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缺陷, 诘难、嘲弄这种基础主义的、本质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启蒙哲学。在后现代主义看来, 消解了启蒙理性就摧毁了整个现代性大厦存在的根基。因此他们极力拒斥和消解启蒙理性, 企图摒弃和超越现代性, 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状态。在后现代哲学立场中, 他们总是首推尼采对理性形而上学的解构。尼采主张本能高于理性, 他以反抗理性的傲慢扩张和虚妄不实为出发点, 认为理性并非像它自认为的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人并不能理性地控制自己的行动。

收稿日期: 2005-02-01

理性背后有着深层的非理性根源,理性不过是“权力意志”的工具罢了。在此种意义上,理性不过是意志和欲望之手所控制的一架竹制的风筝而已。正因如此,很多学者视尼采为全部后现代思想的策源地,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是后现代的转折点。其实,尽管尼采极力反对理性形而上学,然而,由于他又在人的行为和过程背后预设了一个始源性的“实在”——权力意志,这就最终使他仍陷入了形而上学,只不过是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取代了传统理性形而上学。

实际上,最早最彻底对启蒙理性进行根本解构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拒斥理性形而上学的产物。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他曾经服膺过的理性而离开黑格尔主义基地的。在《莱茵报》的实践时期,物质利益问题第一次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马克思察觉到了所谓“理性的法”与“私人利益”的对立。尽管当时马克思还是从理性原则出发,力图用“普遍理性”来说明国家、法、宗教、哲学等,但是在现实中,决定人们对法、对出版自由等事物的态度不是根据理性,而是物质利益,以致最后连马克思借以宣传“普遍理性”的《莱茵报》也被查封了。国家和法并不是根据理性建立起来的,而是为了维护有产者既得的私利,是对贫苦人民权利的剥夺。从而,他所坚信的理性在利益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在利益和理性原则的斗争中,利益总是战胜理性原则,而不是相反。这个物质利益问题在他的黑格尔理性主义框架中无法得到合理的解答,正是这个苦恼的物质利益问题引导他把眼光转向“原本”——社会经济关系。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始,马克思渐渐放弃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立场,对黑格尔哲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是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13](P100)}。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实体”其实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人的自然,而“自我意识”乃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理性),“绝对精神”则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针对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物本身出发去规定物,而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去规定物,从“自我意识”外化出物性、抽象物,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

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P73)}。马克思历来反对“无人身的理性”,主张辩证地看待理性和感性的属人性,从人的感性和理性互补统一的生存实践出发,瓦解绝对理性的虚妄不实。“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3](P87)}。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明确地用利益替代了原来所认为的理性、原则、思想在历史中的作用。理性、思想或原则不能离开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4](P103)}。可见,马克思已经不是从理性、思想出发说明现实物质利益,而是从现实的物质利益来解释理性、思想。所谓理性、思想、原则或法等,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的利益的表达和辩护,是一种意识形态。理性话语具有时代的建构。决定理性结构的乃是利益。在美丽的理性面具下隐藏着一张张交织着种种私人欲望和利益的脸。

马克思在批判、瓦解了绝对理性的自足性幻觉后,接着对这种神话和幻觉赖以产生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总体批判。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论证了启蒙理性所允诺的人间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王国,在政治解放这一制度框架中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期票,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在经济上,从表面上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种充分展示平等交换法则的理性体系,其实却充斥着私人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的盲目性的矛盾以及抽象理性(资本关系)对人的统治造成的劳动异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只是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这只是有产者的王国,并且是建立在对无产者剥夺的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现代新型的奴隶制。总之,现代文明社会“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15](P24)}。现代主义所提倡、推崇的理性已从批判的武器退化为维持秩序的工具,所有的这一切只能表明资产阶级按理性和人道建立的所谓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2](P272-273)}。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解放只是部分人的解放,真正的解放是人类解放。只有在人类解放即共

产主义这一制度性安排中才能真正克服启蒙理性的缺陷,实现真正的理性社会。这时的理性已经超越了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私利这一狭隘的历史视野,而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和谐一致。社会理性表现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自发性对人的支配,从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合理关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只有在这种自由王国中,那些“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P758)}。或者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5](P89-90)}。

二、主体的批判与重建

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是一种现代观念。在人类社会的前现代阶段,理性和主体性不属于人而属于神。可以说,理性和主体性都是现代性的一项发明,并且两者又是孪生兄弟。正如现代科学取代了宗教一样,理性的个体取代了上帝,所谓民主、自由和解放正是人的主体性的代名词。无论是科学方面还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其他现代观念,都是随着主体的定位而达到定位的,因此,批判现代性必然要批判与它相联系的主体观念。

现代理性主体是从启蒙时代中生发出来的。整个启蒙时代是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历史前提。正如普罗泰戈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成了古代哲人的主体意识的突出代表,当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时,他成了现代理性主体话语的“始作俑者”,由此发生了一场主体意义的“现代转向”。而康德把人的主体性发挥到了极致,人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为自然界立法,为社会立法,于是,在现代主义哲学中理性的认识主体地位最终确立了。理性主体成了支撑着全部知识的阿基米德点。

然而,随着高度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出现,后现代主义认为,支撑西方现代化的理性主体已经日薄西山,威力不再。历史正进入主体性的黄昏的时代。“主体性观念正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6](P1)}。利奥塔通过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分析和考察,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

“自我什么也不是”^{[7](P65)}。福柯在继尼采的“上帝已死”之后,走得更远,趋向极端,在他看来,“主体死了”,“人是短命的历史的化身,有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8](P99)}。后现代主义认为,解构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以理性为根基的主体,就会彻底瓦解人类干预自然、操纵社会的企图。但是,主体与客体、结构和解构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交互渗透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的异化、僵化的同时,把民主、自由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等进步的历史遗产也一同抛弃了,它对社会实践难以产生积极的规范和导向功能。

实际上,对启蒙的抽象理性主体进行批判并不是后现代的专利。马克思通过凸显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对现代理性主体迷梦进行了批判。从实践的需要出发,马克思将启蒙的先验主体消解在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中。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本身,所谓的“自我意识”、“唯一者”、“类”等等都是形而上学的怪影。主体决不是指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意识或自我,而是具有“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现实的人。而“感性活动”决非费尔巴哈意义上的自然生命活动,而是指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活动。感性活动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P30)}。总之,马克思认为,启蒙告诉我们的那个孤立的、理性的主体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抽象和虚构,是非历史的、认识论的、“想象的主体”^{[5](P73)}。实际上,“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6)}。

表面看来,笛卡尔式的那种静观的“我思”的我,是一种孤立的,与他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活动。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3](P83)}。实际上,作为意识活动的“我思”,总是有意识的人和人的意识,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P82)}。

简而言之,“人不是抽象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5](P1)}。不论个人主观上如何企图摆脱各种社会关系,他在本质

上终究是社会的产物。并且,人所生活的世界和社会关系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或主体也是一个变项,也就是说,那种固定的、同一的、先验的理性主体在马克思的社会-实践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被消解了。

在现代性难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的不同旨趣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破坏和消解,而是破与立的有机统一。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理性主体的批判,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联系的、实践论的主体置换了启蒙以来的抽象的认识论主体。实际上,启蒙以来的所谓理性的主体或理性的个人,本身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10](P25)}。不仅如此,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改造自身——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3](P87)}。正是在此意义上,“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1](P95)}。总之,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即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不是通过主观的反思建立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主体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从根本上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P92)}。

不仅如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3](P140)}。社会实践不仅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出关于人的科学,即把人作为被反思的对象和被认识的对象。只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科学才成为可能,才成为科学的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P90)}。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于以实践为基石的主体。

总之,马克思主义通过凸显主体的社会-实践性对启蒙以来的抽象的理性主体进行颠覆,同时,原先的认识论主体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主体中得到重建。

三、历史终结的批判与重建

启蒙以来,理性主义把历史看成是在时间维度上不断进步的,它一劳永逸地抛弃了倒退的、停滞的观念,树立起一种面向未来的、普遍主义、向善的和

进步的千年幸福主义历史观。这种理性乐观主义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充分的表现,而且,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最先从哲学上论证了现代性成为历史的终结,论证了历史随着近代自由国家的成立而终结。也就是说,不断进步的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达顶峰,历史目的已经完全实现,历史终结了。所谓历史终结是指由于社会的重大问题或基本矛盾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因此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种历史终结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最近,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被西方社会当作新福音而大肆渲染,再有,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劳伦斯·卡弘的《哲学的终结》、科斯塔斯·杜齐纳的《人权的终结》等一系列对现代充满乐观主义色彩的“终结论”竞相回潮,一时形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终结话语”。

历史终结论者在宣告意识形态已经衰微,历史已经终结的同时,又极力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辩护,荒谬地认为人类历史最终将向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制度集聚。其实,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这种历史终结论的论证逻辑的荒谬性,他指出:“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只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该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5](P151)}

马克思运用与黑格尔同样的武器——辩证法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没有彻底贯彻他自己的辩证法,而是背叛了它。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2](P24)}。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5](P274)}同时,“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P276)}。实际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作用的肯定比任何一个现代主义者还要充分。但是,马克思没有成为现实的辩护士,他运用经济学实证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而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

具进行不断的变革,否则就不能生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它今后的历史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13](P443)}。而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2](P831-832)}。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P125)}从而,不是黑格尔、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历史的完成,相反,资本主义还是属于为达到真正的人类史的一个“史前史”阶段,它本身不是人类历史的目标,更不是黑格尔、福山所宣称的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目标和终点。真正的人类史发端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彻底消除现代性的异化的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作为彻底扬弃私有财产的必要环节,使人类不再受异己力量的支配而实现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真正占有。共产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终结(“史前史”的终结)而必将到来的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只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费·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7]利奥塔.后现代状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 [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5]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3.

The Two Dimensionalities of Marx's Modernity Theory

ZHENG Yuan-jing, et a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arxism philosophy contains animadverting and constructing dimensionalities because of its practice by spurning metaphysics. Marx animadverted reason and subject and history-end which support modernity, then sublated and re-constructed them under Communism system.

Key words: Reason; Subject; History-end

[责任编辑 张家鹿]